



清白的时光

□袁卫东

清明又至,算起来,父亲离开我已经有21个年头了,每每想起他平凡短暂的一生,最容易让我在脑海闪现的也许就是八个字:善良勤恳、清清白白。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随祖父及一家6口人,响应我省“开垦滩涂、支援盐城”的号召,从南通海门徒步200多公里,举家迁徙到了“茫茫百里芦苇荡”的盐城射阳。17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困,父亲放弃了高中入学,回到生产队务农。

由于父亲有文化,生产队便让他做保管员,之后,他一步一步,从生产队长、大队会计,做到大队长、村书记,这些耳熟能详的“基层干部”,他做了个遍。生性善良、老实本分的他,喜欢与村民们“打”成一片,无论是田头工作、邻里纠纷,还是家长里短、生活困难等大事小事,他总是认真仔细、实实在在为大家做好每一件事,使得大家都很乐意把他当作“知心人”,村民们亲切地称他为“好蛮子”,深得群众的信赖。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民们家里遇到一些红白喜事,总会邀请村干部到他们家里做客,每每遇到这类事情,一再推辞不过之后,他也常自叹不能免俗。即便如此,他有一个原则,吃顿饭可以,但坚决不拿人家的东西。他说:“生活都不容易,没必要,做人还是干净一点好。”有人背后说他“太老实、有点傻”,他只当没听见。

父亲的一生是属于农村的。青壮年时期,他在剧烈、频繁的农业劳动中度过,即使是“官至”生产队长、大队长时,挑河挖渠的事情,他也从来都是身先士卒、带头上阵。40岁的时候,因为太过劳累,他曾两次因肺结核、肺出血住进县人民医院。此后,虽然不能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勤劳做事、为民着想的作风从未改变。在许多村民的眼中,他是一名“正派的好干部”,在我的心中,他是老实本分的父亲,能给家人带来安全感。

43岁那年,在新一届的村主任选举中,父亲落选了。因为工作岗位的原因,他被“安排”到了离家30多里地的经济开发区。说是“经济开发区”,实际上就是当时本县的一块有待开发的荒滩盐碱地。其实,早在十几年以前,父亲就曾带领村民在那儿挖沟开渠,命运似乎有意要跟他开个玩笑,那些亲手开挖的沟沟渠渠,最后被改造成万亩鱼塘,并又变成了他新生活开始的地方。而且,那片土地,最终也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驿站。

父亲一生清贫,去世时,原来工作地的村民还自发赶几十里路过来为他送行。因为一直处于生活拮据的状态,他走后,还给我留下了一些债务。在一般人看来,做了多年村干部的人,这样的境况,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也有人说,那是他没有“本事”的结果,但我知道,他一生中最自豪的,就是自己常说的几句话:清清白白做人,问心无愧做事。这,也许是留给我最大的人生财富。

思念父母

□朱明贵

走出小区西门,沿常新南路与育红西路的交叉口往西再走两三百米右拐,到了我父亲的住处……如今,这条路,跑了整整11年的我,已三年未曾踏进过。因为,三年前的那个凉意沉沉的深秋,我的父亲永远离开我们了。

每次路过这交叉路口,我总会朝西张望,期待能在稀落的行人中看见一位老人蹒跚着朝他儿子家的方向走来。

父母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弟三人。从小,我们是比较畏惧父亲的。他在外工作,有时十天半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我们兄弟与爷爷奶奶和妈妈一起过着清贫而平静的生活。小时候,年幼无知的我们难免调皮捣蛋且生出些麻烦,妈妈能予以制止的就实时“摆平”,真正喝不住的,就声称“等爸爸回来收拾你们”。有一次,哥哥和小弟果真酿出了将邻家孩子耳朵打伤、损坏人家工具之类需要用钱或家长赔礼道歉的“大事”来。果然,爸爸回来后,余气未消的妈妈一“奏本”,哥哥和小弟自然免不了“挨打”。望着爸爸留在哥哥屁股上的掌印以及他对着我们站成一排的厉声警告,从此产生畏父心理,常常在犯错的边缘止步,在贪玩一阵后自觉地挑满一篮猪草。至于妈妈,也很少再因为我们的偶尔顽皮而状告于父亲。

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我们的爸爸妈妈为了儿女们的成长、成家、立业,犹如一对衔枝筑巢的老喜鹊,辛勤奔波在创业置家,哺育儿女的坎坷路上。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生产队社员是靠拿工分计酬分配的。由于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兄弟上学念书,爸爸在外工作,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便是妈妈。她一个人在队场上做饲养员,虽然一天上百担的水呀、饲料呀、猪草呀的又挑又搬,辛苦的妈妈一年忙到头,两三毛钱一个工的工分钱还是抵不了一家人的粮草钱。

回首往事,爸爸作为一家的支柱,在他青壮年时代,常常挂在嘴边的“责任”,除了送我们上学求知,还要为我们兄弟各建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家。为了这样的责任,我们的父母像负重的牛马,开始了历时三十年的艰苦奋斗。

20世纪70年代初,我家建起第一幢砖瓦结构的房子,这在当时的老家大队,算是一大了不起的建设工程。那时我尚年幼,却依稀记得当年爸爸从老远的地方托人买砖并用大船运回的情景。记得爸爸舍不得花钱请车装运,每次回家都用自行车驮回几十支椽子,到家后换下已湿得可以拧下汗水衣服的情景。

第一幢房子建成,只是爸爸“使命责任”的三分之一。自那之后,爸妈驰而不息,有钱还债,余钱再聚,开始第二幢、第三幢房子的筹建。爸爸鸟儿似的,今年钱够买砖了买砖,来年钱够买瓦了买瓦,振作双翅,聚沙成塔。妈妈如黄牛一般,外忙种田内忙养畜,挑背扛拉,丢了翻耙拿扫帚,终日辛劳于与爸爸同一目标践行中。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那已近花甲的爸妈完成了他们的“责任使命”,三十多年间建房三幢,使我们兄弟三人各有居所,成家立业。

但凡与我的父亲相处过的人,包括我们弟兄三家人都认为他老人家“俭”,现在想来,父亲“养成”的这个“俭”并不是他这个独子与生俱来的。奶奶说他从小聪明伶俐,大方得很。只是成为三个儿子的父亲后,责任的使然,迫使他不能大手大脚,逼着他和母亲一起勤劳节俭,以完成作为一个父亲的使命,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因为这样一份爱的使命,我那平时看似要好的父亲创下过12年未添新衣的节俭“记录”……

光阴飞逝。为家、为他们的孩子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如今都已作古,虽然我和兄弟都已届花甲,但成了老去的“孤儿”,我们依然在念想父母太多不容易时而感慨往事潸然落泪。

清明日近,我心沉痛。抬头看向天际,我盼望在某片云彩间看到父母。此时,我想起一首诗:我有所念人\隔在两世间\我懂你时\我已中年\再想你时\你已远去\日子好短\来不及好好道别\日子又好长\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怀念。

妈妈再爱我一次

□王阅洲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孟浩然的诗句算是把清明的思念写到骨子里了。随着清明的到来,我那贫穷幸福相伴,慈爱严教并济的童年时光不时出现在夜深人静的梦里。母爱的点点滴滴像一幅长长的画卷,从记忆的深处一下子展现到眼前。

我童年的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到一颗水果糖要咬开来分着吃,家家户户很难吃上一顿富足的饭菜,逢年过节也没吃过一顿管够的猪肉,我们家更是困难户中的困难户,一天三顿,粥都不能周全,更不用说干米饭了。有一年春头上,青黄不接,看我们兄妹实在太饿了,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把年前的带壳高粱放在水里浸泡一天,然后连夜用手搓去壳,只为了我们能吃上一顿高粱干饭。中午时,母亲端饭的手缠着纱布,鲜血从纱布里渗出来,二姐托住母亲的手忍不住掉下眼泪,母亲说,“没事的,就破了一点皮。”弟弟很快把一碗饭扒光了,说:“没吃饱。”母亲随即把碗里的饭分一半给弟弟,嘴里说道:“快吃,妈妈不饿。”当年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现在想起来,这就是“为母则刚”。

我上小学一年级那年中秋节,远嫁扬州的二姑母回娘家,带来了六块用油纸包装的冰糖月饼,这在现在真算不上什么,可在当年那是“高级”食品了。我闻着透过油纸散发出来的荤油香味,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好不容易等到中秋节下午,原指望能分到一块月饼,没想到母亲让父亲送一块给小庄上的二奶奶,送一块给外婆,送两块给和我们家非亲非故的孤寡老人老爹爹,剩下的两块我们兄妹九人一人半块都分不到,所以在母亲分月饼时我眼珠子都要盯出来,发现一块比较大的,刚想伸手,被母亲挡了回去:“那是我和你爸还有你大姐的份。”傍晚,父亲和大姐做工回来,母亲把那份月饼拿给大姐,大姐递给父亲,父亲又塞到大姐手里,大姐又要给母亲,母亲说:“我吃过了。”大姐和我们是同父异母兄妹,年龄相差很大,她把月饼又分给了我们兄妹3个,如今父亲、母亲、大姐都不在了,但这份浓浓的亲情,沉甸甸的母爱温暖了我一生。

屋漏偏逢连夜雨。从小就体弱多病的我,连续两年都患脑炎,第一年,母亲把积攒多年准备砌间厨房的几十元钱全部拿出来用光了。贫困的家庭根本无力再支付医药费,而且救活的概率很低,左邻右舍和医生都劝母亲放弃治疗,母亲坚决不同意,变卖了家里能卖的东西,再次把我从“鬼门关”抢了回来。

母亲走的那年是84岁,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没能让你复读考大学,是我这辈子的遗憾,你也不要怪妈妈了,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就去世了。我知道这也是母亲这么多年的一块心病,那年我高考落榜,复读一年需要十四元钱,可是家里就是拿不出来,我只好回到老家天沟村干农活,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高中学历的农二代。听完母亲的话,我鼻子一酸,一贯坚强的我也止不住流下了泪水,父母本身就没有错,可就在临终时还要把“责任”揽过去。有位作家说过,母爱是人世间最无私、最伟大的。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写下母爱的文字来思念母亲。此时,我更想对远在天堂的母亲喊一声:妈妈再爱我一次。

